



讲台上的民国

刘超
著

讲台，投射出
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

讲台上的 民国

刘超著

Liu chao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讲台上的民国 / 刘超著. --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201-08086-4

I. ①讲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传记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75897 号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：黄沛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：300051)

邮购部电话：(022) 23332469

网址：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信箱：tjrmcbs@126.com

高教社(天津)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6 开本 16.5 印张 1 插页

字数：230 千字

定 价：36.00 元

序 一

马 勇

早几天，清华小友刘超博士发来《讲台上的民国》书稿电子版，希望我抽时间为这本书写几句。我当然知道“人之患好为人师”，更知道“学之患在为人序”。我素来相信真学问是非常私人化的事情。写作者用几个月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打磨出一本书，批评者想在一个短暂时里说出个子丑寅卯，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因为，批评者只是读了人家的书，而没有也不可能读人家为了写这本书而阅读过的书，更不要说人家多年来的阅读了。

我没有办法对《讲台上的民国》发表批评性意见。读过几章后，却觉得应该说点赞美的话。古人说后生可畏，我们年轻的时候体会不到这句话的真意，到了一定年龄，再看这些后生晚辈，不得不承认长江后浪推前浪。我们这一代“老三届”、“新三届”，大约只是“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”。中国学术的正常发展，应该寄希望于接受过完整训练的新一代。

刘超的这本书，从书名上，我一开始没有悟出究竟里面说了什么事，因为“讲台上的民国”太容易引发其他联想了，打开后方才知道是在为民国学术大师作传记，几十个在民国大学讲台上的大师被写得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。

对于大陆读者来说，“民国”只是一个遥远的记忆了。由于现实的教育不尽如人意，我们大陆的读者，甚至许多作者，对民国的记忆越发浪漫，近乎想象了。巧的是，我这个学期正在台湾一所大学里教书，对大陆读者来说的历史回想，在我的眼前就是正在发生、发展的现实。民国的讲台依然还在，民国的大师也没有走远，台湾今天的教育，实际上接续 1949 年前中华民国教育往前走。

以台湾的大学比照我们今天大陆的大学，究竟差距在哪里呢？今天大陆的任何一所大学，如果从硬件说，可能都不比台湾差。所差的，只是软实力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差距，就是传统。

比如说今天的北大、清华，尽管还在北京，清华甚至还在自己的老地方。但1949年实际上将清华、北大的历史分成两截。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说1949年“获得了新生”。必须承认，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，这样的判断确实不错，因为一切都在那个时候改弦易辙。

对于大陆的读者来说，民国确实渐行渐远了。“讲台上”或许依然活跃着许多新一代的大师，但这批新人与1949年之前的“旧人”比，总觉得缺少一点个性，缺少一点故事，因而这些年不经意间流行起来了一股怀旧思潮，甚至出现了“民国范”这样的概念。刘超的这本书，大致可以归属于这一类，以温情和敬意讲述“民国讲台上”的那一代大师。

与坊间流行的“民国范”读物稍有不同，刘超属于学院派，或者说是学院正儿八经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历史专业人才，他们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，也有长达十几年的专业潜心苦读，熟悉基本史料，具有相当学术功底。他们这一批新生代写作者的加盟，可以预期，要不了几年，大陆文史出版物会在学术品质上有一个提升，学术品位一定会渐渐不一样。

对于年轻一代专业史学人才介入大众历史书写，学术界褒贬不一。我个人倾向于支持。我觉得学有余力，且有比较流畅清新文笔的，抽时间为大众写上几本具有学术厚度、深入浅出的作品，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。个性化的书写，一定会潜移默化改变着一个社会的思维，提升社会的品位。

从另一个方面说，学术史从来不会因为书写样式去判定一本书是学术的，还是通俗的，不会因为通俗的不加注释的表达就判定一定是没有学术内涵的。古典的中国学术不必说了，即便近代新学术出现之后，我们去读梁启超的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读周予同的《经今古文学》，读张荫麟的《中国史纲》，读蒋廷黻的《中国近代史》；即便到了当代，我们读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，读唐德刚的《晚清七十年》，读黎东方的“细说”，我们从来不会因为他们的作品没有注释、没有引文、行文通俗简明而忽视而贬低。我们从他们的著作中获得无穷的启示，知道做学问的甘苦，知道什么叫做举重若轻，怎样才能举重若轻。

读了刘超兄这本《讲台上的民国》，引发几句感想，如若不妥，还望作者、读者不吝赐教。

2013年11月15日于台中

序 二

谢 泳

刘超还在读书时,我们即相识,想来已是八九年前的事了,那时我在山西,他在北京。因为关心西南联大的历史,我们有过通信联系。多年来各自在南北奔波,见面机会极少,但他的学术进步,我却非常了解。他在清华开始攻读博士以后,学术重心也放在对中国现代学术史方面,发表过许多有创见的专业学术论文。

在刘超这一辈的青年学人中,他是那种在读书期间即确立自己学术方向的人,所以他的学术道路开始得很早,也相当顺利,积累比较厚重。

刘超还有一个特点是专业之外,能写有很强可读性的学术散文,能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散文写作结合在一起,所以写作数量相对较多,一度时期,我几乎能在国内多数有影响的文化期刊上看到他的文章。刘超现在把这些文章集合在一起,要单独出版。我读了全书,感觉虽是散文类的学术文章,但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为一册中国现代学术史。因为中国现代学术中最重要的是学者,最吸引当代读者的也是这些学者独特、传奇和富有个性的人生,至于他们的学术成绩,则专业之外能关心的人,说实话,可能不在多数。中国现代学术史的魅力主要在学者的人生,刘超正是恰当把握了此点,所以选择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学者,用自己优美的文笔叙写他们传奇的人生。因为刘超自己有专业训练,所以他笔下的学者人生,是建立在丰富史料基础上的叙述,而不是信口开河的描写。我说此书可当一本中国现代学术史来读,就是因为作者有这样的追求,也有这样的叙述能力。可以说,这是一本有史料的书,也是一本有趣味的书。我乐意向读者推荐此书。

是为序。

2013年11月18日于厦门

目 录

王国维:消逝的小辫子 1

一般学子其实也只有在课堂上才见到这位老先生。有个叫王力的说他“留着辫子，戴着白色棉布瓜皮小帽，穿长袍，勒一条粗布腰带，一个典型的冬烘先生的模样”。那一阵讲的是《尚书》，他偶尔也说：“这个地方我不懂。”但又说：“我研究的成果是无可争议的。”

辜鸿铭:四洋踏遍尔独行 7

开课之初，他就对学生宣告：“我有三章约法，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，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。第一章，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，上完课要我先出去，你们才能出去。第二章，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的时候，都得站起来。第三章，我指定要背的书，你们都要背，背不出来不能坐下。”

梁启超:从报界骄子、政界赤子到学界巨子 18

梁讲课时，对国学经典信手拈来，运用自如，常常还背诵大段大段的原文。偶尔地，他背诵不畅时，乃用手指在脑门上轻敲几下，遂思路贯通，又滔滔不绝起来。

陈寅恪:一生负气成今日，独为神州惜大儒 35

当时学界很不景气，不少归国留学生做教授多少年了，还是拿当年留学时的笔记当授课讲义，混了一年又一年。陈寅恪不然。他说他是“三不讲”，书

上有的不讲，别人讲过的不讲，自己讲过的不讲。这样，他备课、讲课就和做研究一样辛苦，有时提前七到十天备课。

黄侃：章门“天王”的狂士生活 51

一次，他在课堂上赞美文言文之高明，却把胡适和他的白话文也捎上了。他说：“如胡适的太太死了，家人电报必云‘你的太太死了，你尽快回来’。长达十一字。若用文言，只需‘妻丧速归’四字即可。仅这电报费就省了三分之二。”

刘文典：是真名士自风流 57

刘文典讲课时，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，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。刘教授闭目讲课，每讲到得意处，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，然后问道：“雨僧兄以为如何？”每当这时，吴教授照例起立，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：“高见甚是，高见甚是。”

邓之诚：旧时燕京“明朝人” 65

他空手而来，不带只文片纸。往台上一站，摘下帽子，放讲桌上，深深鞠躬，脑门碰到桌面，说：“同学们，我来看看你们。”一口西南官话，温文尔雅。此种繁文缛节，在他这儿从不省略。

熊十力：从枪杆子到笔杆子 70

他的课很特别：一旦说至重要关头，他往往意气风发，情不自禁，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肩上重重拍一巴掌，然后哈哈大笑，声震堂宇，而对方却被打得东倒西歪。因此，人们来听课时，总找一个远离老师的座位，以免被他老人家当堂“棒喝”。

汤用彤：渐行渐远的“菩萨” 77

抗战时期，联大精英荟萃，但教授们却入不敷出，生活非常艰苦。此时汤用彤岁数并不大，头发却已近全白。华发早生的汤，远远望去，就像一尊佛像。这正坐实了他“菩萨”之雅称。

张竞生:大起大落的“性”“情”中人 88

一九二四年暑假,有一位想报考北大的学生刚进红楼,见到两张讲座的海报,一张是李大钊主讲辩证唯物主义,另一张是张竞生主讲性学。其父闻知后,担心孩子入学后受此激进思想的影响而生是非,乃强令其改报燕京大学。

吴宓:藤影荷风听雨声 110

当时吴刚刚出版了诗集,学生借口研究典故,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。有的他不愿说。可他像个不设防城市,一攻就倒,问什么,说什么,连他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了出来。他自觉失言,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,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。

楼光来:远去的“无字碑” 122

楼学贯中西,文通今古,于“莎学”造诣尤深,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权威和亚洲七大莎士比亚专家之一。他发言时常引用欧美名作,往往短短的几句话就是不同作家的引语连珠,堪称“中外古今的图书皆我注解”。众多同行也为之折服。

叶公超:最是文人不自由 128

他不怎么备课,总是天马行空,随兴所至,信手拈来皆幽默。一次谈到服饰,他说:“西装袖子的纽扣,现在用来做装饰,其起源乃防止大家大吃大喝了后,用袖子揩嘴巴。洋人打领带更是妙不可言,便利于让人牵着脖子走,而且要面对着牵他的人,表示由衷地臣服。”

夏济安:寒枝拣尽无栖处 139

他才气横溢,诲人不倦,颇有名士风貌,深博女生好感。好几位女子对他饶有兴趣。怎奈他命运乖蹇,人家属意于他的,他偏偏看不中;自己看中的,却求之而不得。

曾昭抡:兼资文理此全才 150

在联大,他名气大得不得了,因为他的成就,也因为他的脾气。此公连鞋

都穿不好，一年到头，他总是穿着那双天不怕地不怕的鞋子。那鞋子已经破得前头见脚尖，后头见脚跟了，他还是日复一日地套在脚上。

潘光旦：忍将身世寄鸥游 161

潘光旦的博学多才早已驰誉儒林，成为各方公认的“活字典”。在西南联大这鸿儒云集之地，遇有难题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：“走，问潘光旦去！”潘氏有才气而无脾气，博学而谦冲，自是不二之选。

方东美：诗才·哲思·佛缘 168

一名学生为了某个问题去请教哲学系的方东美。不料，中文系的一位教授对同一问题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。学生跑去请方再次确认答案。方毫不犹豫地答复道：“请转告他，这是你老师讲的！他若问你，你的老师姓甚？——姓方。哪里人？——安徽桐城。那就够了！”

向达：敦煌与之同在 179

一九四六年十二月，北平发生了抗议美军暴行运动，特务公开在北大民主广场撕毁进步学生有关罢课斗争的布告和标语，向达立即上前制止。暴徒们大吼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有什么资格讲话？”他一字一顿地回答：“国立北京大学教授，姓向名达。”

邵循正：真正的“读书种子” 187

邵讲课从无讲稿，但讲起来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。一次，他作题为《元遗山与耶律楚材》的讲演。当晚教室里都坐满了人，中途停电，一片漆黑，邵只好摸黑继续讲下去，旁征博引，娓娓道来，依然讲得有声有色。听讲者无不为其过人的才学和非凡的记忆力所打动。

邓广铭：博学于文，行已有耻 198

他打算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辛弃疾研究的课题经费，并为此征求胡适的意见，胡适勉励道：“三十多岁的人做学问，那是本分；二十多岁的

人做学问，应该得到鼓励。”这话让他记了一辈子。在他晚年时，书房里总是挂着一帧胡适遗像。

孙楷第：旧时月色忆前尘 207

北大国文系的学生们见到这位病弱的先生，实在于心不忍，就提议捐款让孙养病。孙知悉后，立即毛骨悚然，严正拒绝，理由是：“君子当爱人以德，一个念书人第一要廉。廉者不苟取于人，亦不轻受于人。”

沈从文：“乡下人”，从边城走向世界 213

为了这第一堂课，他准备了良久，可上讲台后，他足足站了十几分钟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后来，终于说话了，可是十来分钟就把整堂课的内容讲完了。这时，离下课尚早，他拿起粉笔写道：“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，人很多，我害怕了。”有人把这事反映给校长胡适，胡适说：“上课讲不出话来，学生不轰他，这就是成功。”

林庚：燕南深处有布衣 226

整整一节课，先生只讲了一首诗，然而，却讲得激情飞扬，左右逢源，贯通古今，纵横捭阖，出神入化，炉火纯青。在先生的讲授中，长眠千古的屈子和诗仙奇迹般地得以复活，带着五千年华夏文化的精魂，洞穿时空，直击今人的心灵世界。

季镇淮：从春城到燕园 233

他一再地告诉过他的学生：有些书不值得读，有些会议不要参加，有些文章不要写。这“三不”原则，他始终践行。在他看来，一个人，一个学者，他的眼光、器量、胸襟气度，以至他的水平、成就，不仅表现在他读了什么、做了什么、写了什么，同时还表现在他不读什么、不做什么、不写什么。斯即所谓品格。

前尘·拾年(代跋) 247

王国维：消逝的小辫子

一

大清皇帝被请下龙椅后，北京城里的小辫子是一日少似一日了。有人甚至放话说：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。”“头”和“发”不许并存。到底是要这颗头，还是要这头上的辫子，恁是谁也不糊涂的。于是辫子就愈发地日见其少了。又过了些年头，就只剩了两根极其著名的小辫子：一根在北大，一根在清华。

二

却说早些年，东洋人照例是不大瞧得起中国的，就连在中国学方面，也瞧不上中国学人。不过，有一次，一位日本学者却在上海的中国学生里发现一位年轻人“头脑极明晰，善读日本文，英语程度也很高”，尤其是对西洋哲学极其用功。他知道，他遇上了一位异常罕见的“学材”，于是惊叹道：“他的前途必将令人瞩目！”

其实年轻人不过是个身高约一米五的海宁人。辛亥革命之后，这海宁人拖着那小辫子，来到东洋。从此，日本学者能够不时地看到那闻名已久的小个子。有时候，当地学者正在聊天，听见窗外那细碎而轻微的脚步声由远而近，于是不约而同地说：“‘龅牙’来了。”大家相视，会心一笑，准备洗耳恭听了。很快，一位年轻人就出现了。一进门，他就对内藤湖南等日本耆宿恭恭敬敬地鞠躬。他性喜沉默，声色暗哑，说日语也口吃，可是没有人嘲笑他。自然，很多人最初都不信：这邋遢邋遢、口吃得厉害的小个子就是那赫赫有名的人物？

一次，一位叫青木正儿的著名日本学者慕名来谒。来者在一座小楼房前

停住，恭恭敬敬地问道：“王先生在吗？王先生在吗？”应声而出的是个中国女佣。女佣叽里呱啦嚷了一阵，出来一个小个子。青木不以为然地瞧着这位“垂着辫子、相貌丑陋”而奇矮的乡下人。“我找王先生。”他说。“我就是。”对方答。他说话果然有些口吃。

后来，日本友人发现，这小个子经常一天到晚都在看书、写东西，而且不时地随地吐唾沫。他的屋子小得什么都没有。有一次，朋友要借便所一用，他很阔气地指着园子，说：“请便。”

然而，正是这小个子，这貌不惊人的小个子，以一篇名为《生霸死霸考》的文章，震服了众多东洋学者。这时，无论是在哲学、美学、词学、曲学、红学、金石学还是在翻译方面，他都攀上了极高的水准。在其笔下，东洋学者看到了“万马骈镳而驰骋的盛观”，东洋学界“大受刺激”。——年纪轻轻的他，已经让人感到敬畏。

不到四十岁，他就已成为中国最顶级的学术大师，奠定了一代中国学术的基础。在短短二十余年间，他就涉足了哲学、文学、史学、美学、伦理学、文字学、考古学、心理学等众多领域，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取得了第一流的成就。

毫无疑问，他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他早岁研习西方哲学、美学，深造有得；稍后，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，独辟蹊径，取得空前成就。中年以后，他专治经史，提倡“二重证据法”，以出土文物和古代史传相参证，形成精确的论断，澄清了殷周史的诸多疑难。他虽自居为遗老，政治上颇形保守，但在学术上却完全采行近代的科学方法。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，他就已被公推为世界级学者。一九二二年胡适论及南北学术时，曾言：“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，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，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。”而“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，首推王国维与陈垣”。便是那眼高于顶的伯希和也公然对自负而爆红的胡适说：“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，惟王国维及陈垣两人而已。”

——这都是后话了，暂且不表。

三

民国六年，蔡元培任北大校长，力邀此君来北大，被拒。几经斡旋，他才勉

强同意出任其研究所通讯导师。

民国十四年，清华办国学院，拟请校友胡适当导师。这位红得发紫的人物大为谦恭，说：“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，我实不敢当！”于是转荐了几位真正的大师级人物。其中，自然有这蓄小辫子的先生。这是万众瞩目、众望所归的殊荣，可他并不乐意。因为体弱，因为家累，因为别的，也许仅仅因为不愿意，他就是不来。众人左努力右折腾一番，硬是不成。无奈，只好采取非常手段，请废帝溥仪下诏书，命此人来清华。此人曾是溥仪的臣民，也曾是其老师。老师谨遵圣命，这才来到清华园，顺便把那著名的小辫子也拖了进来。

从此，清华园中就多了一位拖着辫子的人物。他活动很少，一旦出现，每每都要引人注目。他已成为一道风景。曾有位日本学者找来清华园，门房问找谁，来者告之找那位拖着小辫子的先生。这拖着辫子的门房即刻很崇敬地说：“你真了不起！”来者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答曰：“凡拜访那位留辫子的先生的人，都很了不起！”

那一年秋，清华教职员在工字厅聚餐。名流甚众，衣冠楚楚地坐了十几桌。正厅的一桌是校长曹云祥和新聘的几位教师。

有一位作家正在吃饭，夹了一块海参，刚要张口，听得邻座有人喊：“看！王国维！”众皆肃然。作家筷子中的海参即刻滑落，他随之看到的是坐在校长对面的一位老头儿：清瘦而微须，红顶小帽，青马褂，最是那小辫子和玄色扎腰极引人注目。老者谦恭而拘谨地呆坐无语。满室的人都在喧闹笑谈，似乎唯有他是安静的、沉默的。除偶尔动一动筷子，他什么都不甚理会。校长的态度倒很是周到，他话很多，每一句话都必问到那老先生。对方只是微笑点头，没有旁的回答。饭后，照例是各种余兴——清唱、谐谈，诸般游戏。众人不亦乐乎，可是却不见了这老先生。这次聚会像是榔头，一下就把这不善应酬的人打回了书斋。此后所有聚会上都难得再见他身影。但大家对这位先生的兴趣却越来越大，以至于在应酬场合，凡有些地位的客人，不管他是哪一方面的，总要把视线和话题往这位先生身上引过去。

这小辫子先生对此从不在意，他依旧终年隐没于故纸堆里，每天都只是读书、写作。他从不过问家务，身上也从来不带钱，薪水由家人代领。他家孩子多，有几个年幼不懂事的，有时顽嬉打架，从后院追到前院，从前院逐到后院，

又从后院厮打到书房，从书房这角滚到那角，最后缠倒在他膝下。他只得拿着一本书，绕屋退避。避退了半天，一心两目却始终不曾离开字里行间。许久之后，家人回来，才将顽童逐走，他才得以坐下看书。

他从来不谙俗务，不做家务，只做学问。平日里，除了三二同事，旁人概不接触。他的字并不算一流，但那小楷自有朴素之美，求字的人也颇不少。除了偶尔为友、徒在扇页上写几行之外，他是难得动笔的。有一次，有人请他替一位福寿双全的老太太题个像赞，他当面就说：“这是应酬，我没工夫。”说罢扭头便走。他总是埋头做事，或者长久枯坐，默然无言。因为心境枯涩，因为内敛，也就忧郁，也就羸弱多病。

一般学子其实也只有在课堂上才见到这位老先生。有个叫王力的说他“留着辫子，戴着白色棉布瓜皮小帽，穿长袍，勒一条粗布腰带，一个典型的冬烘先生的模样”。那一阵讲的是《尚书》，他偶尔也说：“这个地方我不懂。”但又说：“我研究的成果是无可争议的。”

其时他的盛誉早已如日中天，蜚声东西。便是素来孤傲的鲁迅，亦叹说：“要谈国学，他才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。”同时又恨铁不成钢地说他“老实得像火腿一样”。他早年治哲学，但觉得欧西哲学“可爱者不可信，可信者不可爱”，自己“感情苦多，而知力苦寡”，于是转向别处。后来他治文学，“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智多”，于是只好治史。他最终转向了史学和考古学。他的学问日益精湛，他的声名日益崇隆，他的健康也每况愈下。

他那小辫子也跟着他成了名。清廷在的时候，他曾将辫子剪去；清廷亡后，他却把辫子留上了，永远留上了。在清华园，他依旧拖着那辫子，看上去很别扭。满校园的人们也都在议论此事，说它碍眼者有之，说他是遗老者有之。他不在乎。一次，太太替他梳辫子时，问他：“都这时候了，还留着这东西做甚么？”他正经答道：“正是到这时候了，我还剪它做甚么？”

只有斜阳夕照时分，他才从书堆里爬出来，走出西院十八号的深宅大院，在那宽宽的大路上悠游散步。他总是独来独往，表情沉静、和煦而孤独。遇见来人，他只是点点头，微微一笑，复又缓缓而去。人们看见的是一个瘦弱、矮矬的几若恂恂老者的形象。他一年四季穿着不合时宜的粗旧衣服，面部苍黄，凹凸不平，戴一副玳瑁眼镜。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人们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：瓜皮帽下的小辫子，垂到背心的中部。偶尔有一次，一位叫

徐铸成的学子居然在清晨的荷塘边看到那熟悉的身影：瘦小的老者低着头缓缓走过，藏青夹袍，紫缎背心，瓜皮帽下的小辫，随着主人的脚步而轻轻晃动着。

四

那些年真是兵荒马乱。先是冯大帅越出潼关，直逼京师。再是南方的军旗也挥舞过来，几位读书人的脑壳也随着革命浪潮被撂到了地上。天要变色了。京师躁动，不少人惶惶不可终日。京郊的清华园沉静依然，只是这羸弱的老先生已经不能整日静坐下去了。他看似一如恒常地寡言少语，但心里已很有些惴惴不安了。写字时，他感到手有些不稳，字迹也平添了几分苍然。

那日国学院全体师生聚餐，那小老头儿极其难得地来了。一位蒋姓学子正好和老人并肩而坐。老人知道学生是黑龙江人氏之后，便一改木讷，很是关切地询问关于东珠和鄂伦春族的情况。那日学期正好结束，暑假即将开始。老先生的课已上完，他的事也就忙完了。

时令已近端午，塘中的荷花依旧沉睡，栀子花在预备着吐蕊，蔷薇已暗香浮动。第二日，他早早地就起来了。七时，他略略整理了一下书桌，吃饭后就出去了。因为身无分文，他向同事借了五元钱。

及近傍晚，倦鸦归林，西天的残阳如血一般红。家人这时还不见他的踪影，立即就着了慌，这里找，不见，那里找，还是不见。末了，终于赶到颐和园。有人说，早上昆明湖边行人稀寥，仅一园丁在打扫行道，有一小老头儿独行至鱼藻轩。他点燃一根烟，慢慢吸着，若有所思。忽然，扑通一声，湖面泛起些许涟漪，轩中已不见了人影。

人们看到的是一具瘦小的躯体，拖着小辫子。

不日，东西学人立即为一个噩耗而哀恸：东亚失去了最杰出的学者，他叫王国维。

他只活到五十岁，活到五十岁他就去了。这个正当年的拖着小辫子的人物，为何选择了这条不归之路？所有人都弄不明白，所有人都在猜测。只是这一切的一切，都与此君无关。他已长眠，再无言语。

五

很不巧，第二年上，另一根著名的小辫子也垂下来，不动了。它的主人叫辜鸿铭。